

以“国家治理论”为核心的中国财政学教材重构

刘晓路

教材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石。在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史上，有过两次重大调整。一个是以 1964 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编著的《财政学(初稿)》出版为标志，“国家分配论”取代“货币关系论”成为新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中国财政学正式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另一个是 1998 年“公共财政论”奠定了其在财政学中的主导地位，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我国日趋盛行，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却鲜有提及。但进入新时代后，我国财政学教材建设未能出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变化。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意味着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的变化，对社会实践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特别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理念，更是将财政实践和财政研究推向国家治理领域变革的前沿，亟须推进以“国家治理论”为核心的中国财政学教材重构。

西方财政理论存在两大缺失

我国目前的财政学教材存在理论与现实脱节问题，特别是西方主流财政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财政实践，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缺失，即西方主流财政理论中缺少对“国家”性质和类型的分析，以致将以美国为蓝本的“自由放任的多元主义”国家视为现代国家唯一正确的存在形式。但实际上，不同国家的国情体制差别巨大，民主制度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发达国家间的价值观亦存在明显差异。另外，由于西方财政学界以美国为研究中心，我国的财政学教材也受此影响。比如，“财政联邦制”的运作机理，与美国的地方自治与选举制度密不可分，迥异于中国国情，但在许多教材中却成为解释我国分税制的主要理论依据。

其二是社会缺失，即市场失灵理论中没有考量社会因素，以致未能将社会问题作为财政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多数教科书以市场失灵为现代财政活动存在的理论依据，并由此诠释财政职能。但发达国家的财政收支绝大部分都与“社会”相关。一方面，以美国、德国、

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社会性、福利性支出占其全部财政支出的60%以上。按照OECD的定义,这类支出的目的就在于将国民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税收理论看,个人所得税相较于间接税的主要优点,就是有助于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可见财政收入中鲜明的社会性意图。对于中国来说,社会因素更是财政实践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与我国取得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相关的财政实践,并不能简单用马斯格雷夫财政“三职能”论中的收入分配职能来解释,而是要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

财政学教材脱离现实问题溯源

笔者认为,上述脱节问题的存在,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学术传统固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财政理论逐渐取代“国家分配论”,成为新的主流。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式微、拥有经济学研究背景的学者数量不断增加,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看法日益成为共识。这就导致即使在具体研究时意识到理论与现实脱节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但在总体研究框架上,很难摆脱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影响,在驾驭“国家”与“社会”因素方面更是困难重重。

第二,理论储备不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瞩目成就,在实践层面上为国内财政学者质疑西方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在理论层面上,仍未能合理地消化吸收西方学术成就,实现自主理论的创新与完善,进而将中国实践的特殊性转化为理论上的一般性。即使在个别领域存在理论突破,但像西方主流财政理论一样,能够在哲学观、方法论等各个方面都得到支撑的系统性理论尚不存在。当前的财政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西方理论框架+中国实践经验”的组合,但使用这些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现实,倘若不使用这些理论,就易导致教科书体系碎片化,可谓左右为难。

第三,写作框架单一。演绎法与归纳法是两种主要的论述框架。西方主要的财政学教科书基本采用“演绎法”的写作框架。首先通过经济学分析得出若干价值标准,然后以此为据对各个领域中的财政现象的合理与否进行评判。这些价值标准都是基于西方国家发展经验而归纳的产物,对于与这些经验不符的实践活动,天然就带有忽视或否定的倾向。我国的财政学教科书在参考西方教材的同时,也引入了这一特征。尽管许多教材做出了本土化的努力,充分使用中国的数据和案例,但却无法改变价值判断的倾向性。相比之下,参考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的基本结论,主要采用归纳法的论述框架,不预设立场地从自身实践中

总结经验，以事实为准绳判断财政实践成败，应当是更切合我国实际的财政学教材写作方法。

切实推进中国财政学教材重构

首先，坚持教材编写视角的多学科原则。推动财政学教材的编写者与讲授者，吸收融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在此基础之上对财政现象做出充分解释，特别是要正确认识中国财政实践的特殊性。既要避免戴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色眼镜”而对中国财政实践产生理论偏见，也不应为了迎合中国现实而否定现代财政发展的一般规律。相较于西方财政学教材单纯强调经济学视角，新时代的中国财政学教材有必要增加国家与社会视角，以对现实进行更为客观实际的刻画。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得到新中国财政实践印证的观点为核心，形成系统的“国家治理论”财政思想。一方面继承“国家分配论”中“财政以国家为主体”的观点，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环境下，把对财政本质的理解提升到支撑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正常运作的高度上来。这也恰好与中国古籍中财政为“治国安民之本”的理念遥相呼应。教材编写应当致力于展示现象，提供分析现象的理论线索，并鼓励读者进一步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此过程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在财政中的作用都能得到体现，财政的职能也不仅仅依据市场失灵理论而圈定在经济范畴之内，而是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从而弥补西方财政理论中“国家缺失”与“社会缺失”的局限性。

其次，坚持教材写作框架的归纳法原则。西方财政学教材以经济学范式作为统领全文的价值标准，其最开始的章节一般都在介绍经济学基本理念与方法。采用归纳法的论述框架，意味着在区分出各个财政学领域后，每章都要对涉及的领域进行基本概念、原理和典型事实的介绍，不预设价值判断，以实践结果作为理论合理与否的评判依据。对于较为复杂的问题，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但不下结论的做法。相应的，历史背景、制度演进等时序性因素所占的篇幅必然有所增加，财政史在理解财政现象中的作用也会更加突出。对于中国的财政实践，更是要对其来龙去脉做详细说明，至少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的财政实践进行梳理，以免割裂改革前与改革后财政发展的一体性。有些领域（如财政体制中的郡县制传统），甚至需要更久远的追溯。毕竟，鉴古知今是中国学术的重要传统。以事实、史实为基础讨论中国财政学基本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坚持教材选取内容的本土性原则。中国财政学教材必然要立足于对中国现象的说明和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实践及相关理论的诸多创新为创造“中国奇迹”发挥了

功不可没的作用。在教材写作中，不但需要对财政诸领域的重大实践活动进行理论阐释，而且应对中西财政的理论异同和实践差别进行客观剖析，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个方面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借此讲授“中国故事”，帮助读者客观认识中国国情，在认同“中国道路”的同时，自觉增强理论自信与学术自信。

启动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代志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高宏宇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程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摘要：经济学启动实验研究借鉴实验心理学中的启动方法，从社会认同理论和内生偏好理论出发，探究社会身份、文化和规范对偏好形成和个人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结合理论模型和具体研究案例，系统梳理经济学领域开展启动研究的最新进展，对启动研究的实验设计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说明，并总结启动方法在实验的可复制性和伦理道德方面所面临的争议。启动方法在国际经济学界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一方法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制度、理论和应用三个层面分析在中国开展启动实验研究的必要性，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背景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思路和展望。

关键词：启动 内生偏好 社会认同 实验经济学

一、引言

传统经济理论通常假设偏好是外生、稳定且不随时间变化的，但对偏好内生性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能够对偏好产生重要影响。为探究环境对偏好和行为影响的因果效应，经济学家开始采用实验心理学的启动方法（priming techniques）（Cohn & Maréchal, 2016）。启动方法主要应用于心理学研究当中，实验者通过细微的情景线

*代志新、高宏宇、程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邮箱：dai@ruc.edu.cn, hongyugao@ruc.edu.cn, chengpeng97@ruc.edu.cn。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非威慑因素的助推机制设计：来自随机自然实地实验的证据”（72273145）。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的建议，文责自负。

索来激活实验对象记忆中有特定关联的心理概念,进而分析该心理概念对实验对象在后续实验任务中的判断及行为的影响。启动使参与某一项实验的被试暴露在某种刺激下,通过文字、图片、音乐或者视频等方式激活被试诸如思维、刻板印象或者态度等的相关记忆。启动这一过程可能会影响被试在实验后续任务中的表现,被试受启动刺激所产生的后续反应被称为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Tulving et al, 1982)。启动可以分为概念启动(conceptual priming)和知觉启动(perceptual priming)。概念启动基于刺激的概念,主要通过语义任务激活与刺激概念相关的一些特征,比如,由于“桌子”和“椅子”属于同一类别,实验者给被试展示“桌子”这个词汇,会让被试产生对“椅子”的启动效应。知觉启动则基于刺激形式,以刺激形式和外部形状起作用,常见的知觉启动有:词干补笔、视觉、听觉和知觉刺激等(Keane et al,1991)。

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文化(culture)和规范(norms)对偏好和行为的影响,但使用传统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认同对行为的因果效应存在明显的缺陷。正如 Cohn & Maréchal (2016)所指出的,首先,研究者很难获得关于社会认同、个人偏好及经济行为的微观观测数据。其次,实证方法很难将不同的社会认同因素进行剥离,比如一个人有很多个社会身份,很难明确哪个社会身份在起作用。再次,个体的社会身份并非随机分配而来,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会吸引具有不同偏好的个体,比如不同的宗教团体可能会吸引具有不同社会偏好的人,不同的职业可能会吸引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人。最后,实证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由于观测数据的局限性,很难干净地识别出个人社会认同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因果效应。启动研究则通过实验技术手段操纵特定社会身份的显著性,可以避免选择性偏差、混淆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根据心理学中的自我分类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被称为“启动”的环境因素可以暂时使某一社会认同凸显,改变个体在给定时刻对特定身份及其相关规范的相对权重,使得一个人的行为趋向于所启动的社会认同相关规范。启动实验的随机分组确保启动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没有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差异,因此,干预组和控制组的任何行为差异都揭示了启动社会认同的边际行为效应(Benjamin et al,2010)。

本文聚焦于在激励性实验中使用启动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本文首先介绍经济学领域启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系统梳理关于启动方法的研究进展;再次,本文介绍经济学启动实验设计的基本步骤和启动实验面临的争议;最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和现实背景,本文对在我国未来开展经济学启动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我国经济学界开展启动研究提供借鉴。

二、启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启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认同理论和内生偏好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人们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自利偏见，内群体是人们认同的群体，外群体是人们不认同的群体。个体出于社会身份的相似性考虑会对内群体的评价比外群体更高，更有可能帮助内群体成员，并对内群体成员表现出更为慷慨的行为、更少的嫉妒行为、更多的积极互惠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行为（Tajfel & Turner, 1979）。因此，启动相同的社会身份会带来内群体偏爱，而启动不同的社会身份则会引起外群体歧视，从而导致群体分裂（Chen & Li, 2009）。内生偏好理论认为，个人偏好并非一成不变，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等因素都会与个人偏好相互作用。启动通过操纵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身份的凸显性，暂时性地使个人偏好趋向于所启动的环境因素，进而衡量这些因素对个人偏好的边际效应（Cohn et al, 2017）。本节将结合具体实验研究和理论模型来介绍经济学启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所提出的。社会认同是指个人来源于对社会群体成员感知的自我意识，包含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类别及其规范自我意识。属于某一社会群体的个体会从该群体中获得社会认同感，而这种社会认同感是个体自尊的重要来源。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有三个过程：社会分类、社会认同和社会比较。第一阶段是社会分类，人们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个体进行分类，将自己归入某一社会类别。第二阶段是社会认同，人们接受所归属的社会类别的身份，并遵循该社会类别的规范。第三个阶段是社会比较，人们将自己所归属的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以维持群体自尊，形成对自己所属社会类别的有利偏见。社会认同理论能够用来解释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运动及劳工纠纷等（Tajfel & Turner, 1979）。

Akerlof & Kranton（2000）首次将社会认同引入经济分析，认为个体的社会认同决定其在特定情境下应做出何种行为。他们构建了一个新古典主义效用函数，根据这一效用函数，个体的效用取决于自身的社会认同、行为以及他人的行为。自身和他人的行为决定了个体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所以效用函数能够捕捉到自身行为和外部性对个体效用的影响。其中，个体的社会认同取决于个体被指定的社会类别、个人特征、个体特征同所指定社会类别的规范相符合的程度以及自身行为和他人行为同社会规范所规定行为相符合的程度。个体可以通过选择自身行为和社会类别来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此外，个人的行为也会影响某一社会类别的社会规范和由社会认同所反映的某个社会类别的社会地位。

根据 Akerlof & Kranton (2000) 的理论分析, 社会认同能够从以下几个维度解释经济现象: 第一, 社会认同能够解释看似有害的行为, 某些人的行为在具有其他社会认同的人眼里可能是不当、甚至是自我毁灭的。第二, 社会认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外部性, 一个人的行为会对其他人的社会认同产生影响。第三, 社会认同揭示了一种改变偏好的新方式。社会认同的概念在社会中会不断演变, 因此可以采取一些方式来施加干预, 例如广告、公共政策、政治游说等。第四, 社会身份作为行为的基础, 社会身份的选择可能是人们做出的最重要的经济决策之一。

(二) 内生偏好理论

Bowles (1998) 对偏好的内生性做了系统说明, 与外来理性偏好公理不同, 偏好可以通过基因遗传和学习获得, 并受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框架效应、内在和外在动机、规范演变、任务绩效及文化演变五个效应之中。一方面, 经济制度会影响个人偏好, 在一套经济制度下习得的偏好是特定的, 如利己主义、机会主义或者合作主义。另一方面, 在特定选择情境下个人的心理因素也会影响偏好, 如强迫、成瘾、习惯等。偏好的内生性意味着个人偏好、技术、政府决策和市场决定了经济运行的结果, 而且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结构也会影响个人偏好。

1. 经济环境与个人偏好的互相影响。经济环境和个人偏好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虽然某些偏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但经济增长也会改变个人偏好 (Bowles, 1998)。在风险偏好维度, Palacios-Huerta & Santos (2004) 通过构建一个偏好内生决定的不完全市场一般均衡模型, 将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结论与实证数据分析结果相结合, 证明了市场范围、个人竞争性内生互动以及风险偏好的异质性形成之间的相互作用。Malmendier & Nagel (2011) 研究发现, 个人所经历的经济波动会影响其风险态度, 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个体在之后的投资活动中风险承受能力更低。在时间偏好维度, Becker & Mulligan (1997) 研究指出尽管时间偏好会对个人投资储蓄行为、经济增长、资产定价、成瘾行为产生作用, 但收入、死亡率、不确定性和成瘾性也会影响个体的时间偏好。在社会偏好维度, Rapoport & Vidal (2007) 研究指出, 虽然利他主义在发达和欠发达经济体中均存在, 但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 利他主义行为直接受个人经济状况的影响, 父母更有可能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

2. 文化背景与个人偏好的交互作用。个人偏好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塑造其独特的个人偏好, 进而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在文化背景对社会偏好的影响方面, Henrich et al (2001) 在 12 个国家的 15 个社会群体中开展了最后通牒博弈、公共物品博弈及独裁者博弈实验, 实验结果显示,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偏好有着很大差异。

在理论层面，Henrich（2004）提出了基于基因遗传和文化传播交互作用的社会偏好进化途径，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具有的社会学习能力使得人类能够拥有大规模的合作水平，人类各类文化群体的进化选择是产生不同社会偏好的基础。因此，个体是否会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取决于其对于群体内部其他人员是否成为利他主义者的预测，即社会偏好的进化结果取决于群体选择。

在文化背景对风险偏好的影响方面，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室实验方法验证了风险偏好的跨文化差异。Weber & Hsee（1998）在一项检验风险偏好是否存在跨国差异的实验中，以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和波兰的被试为实验对象，在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评估风险偏好时发现，中国被试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低于美国被试。而且在风险偏好方面的显著差异主要与风险感知方面的文化差异有关，而非与风险感知态度方面的文化差异相关。Bruhin et al（2010）使用有限混合模型对风险偏好进行了分类识别，并在中国和瑞士两国被试间发现了明显的文化差异。

3. 社会身份对个人偏好的影响。个体的社会身份包含性别、种族、职业及社会阶层等多重维度，行为经济学家结合实验和理论的方法证明个人偏好会受社会身份影响。关于性别对个人偏好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就性别与社会偏好的关系而言，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强的亲社会性，而男性则更关心自我利益。然而，实验经济学家在检验这一猜想时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囚徒困境实验中，有的研究者发现女性比男性合作意愿更强而且更为慷慨（Meux, 1973），而有的研究指出男性比女性合作倾向更高（Mack et al, 1971），还有研究者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合作偏好方面无明显差别（Orbell et al, 1994）。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出价没有区别（Bolton & Katok, 1995）。在性别对风险偏好的影响方面，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在实验中证明了女性在很多方面都比男性更厌恶风险：例如在健康风险（Spigner et al, 1993）、灾难风险（MacGregor et al, 1994）及犯罪风险（Daly & Wilson, 1988）等方面，女性相比男性都表现出更厌恶风险的态度。经济学家对风险偏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财务风险的态度方面，女性接受财务风险的意愿更低，对赌博的风险厌恶程度更高，同时在模拟投资行为的实验中发现女性更厌恶投资风险（Holt & Laury, 2002）。对女性投资者而言，更大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降低了女性的收入水平（Eckel & Grossman, 2002）。

此外，种族、职业和社会阶层也会影响人们的偏好。在种族层面，实验发现黑人有更强的公平偏好，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黑人的出价比其他种族高，而且黑人的出价更加公平，也更可能拒绝不公平的出价（Eckel & Grossman, 2001）。在职业层面，一些实验发现公共部门雇员的亲社会性更强，捐赠行为更加慷慨，更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及帮助他人（Lewis &

Frank, 2002)。Bonin et al (2007) 则提出由于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收入风险大大低于在私营部门工作的收入风险, 风险厌恶的个体会更倾向于在公共部门工作。在社会阶层层面, Tanaka et al (2010) 在越南农村进行的实验结果显示, 生活在贫困村庄的村民风险厌恶程度更高, 而且在时间偏好实验中贫困村庄的村民也表现出更低的耐心程度。

三、经济学启动实验研究进展

根据 Benjamin et al (2010) 所构建的揭示某一社会类别启动效应的理论框架, 个体以最大化其效用函数进行行为选择, 个体的最优行为选择为其未考虑社会类别时的最优行为 x_0 和考虑社会类别时的最优行为 x_B 的加权平均值, 启动某一社会类别会使其行为更加接近 x_B , 这一行为偏离恰好反应该社会类别对个人偏好的边际行为效应。因此, 启动方法是研究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等因素如何影响稳态偏好的非常实用的实验方法。启动方法在国际上已经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应用, 然而在我国使用启动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还很少。当前的启动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认同如何影响个人偏好和经济行为, 但在社会认同如何影响感知规范、认知技能以及启动方法在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本节系统梳理经济学启动实验的研究进展, 以期为在我国开展启动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 社会认同对个人偏好的启动效应

正如内生偏好理论所指出的, 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社会偏好等受经济环境、文化背景、社会身份等多重因素影响, 个人所属的社会类别能够揭示个人偏好的异质性来源。为评估个人所属的社会类别如何对个人偏好产生影响, 实验经济学家采用启动方法暂时提高实验被试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对于某一社会类别的相对权重, 通过激励相容机制来衡量被试的原始偏好参数, 进而参数化测度社会认同对个人偏好的启动效应 (Cohn & Maréchal, 2016)。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启动方法研究种族、职业、文化、宗教、社会阶层、罪犯及环境等社会认同对个体偏好的启动效应。

1. 种族认同的启动效应。种族认同会影响人们基本的经济偏好, 而且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启动相同的种族身份可能会引起内群体偏爱, 而启动不同的种族身份可能会产生外群体歧视 (Chen & Li, 2009)。Benjamin et al (2010) 是首位采用启动方法研究种族认同如何影响个体偏好的经济学家, 他们在启动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之后发现, 与控制组相比, 启动干预后亚裔美国人的耐心程度显著增加。但在启动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后, 土著非裔美国人的耐心程度有所下降而且变得更加风险厌恶。在启动种族认同对合作协调水平的影响方面, Chen et al (2014) 在囚徒困境博弈和最低努力博弈中使用启动方法研究了凸显种族身份对团队合

作的影响,结论是启动亚裔美国人的亚裔身份特征能够显著增加其内群体偏爱,而启动高加索人的种族身份却对其内群体偏爱没有影响。还有学者研究了种族认同对种族偏见行为的影响,例如,Berge et al (2015) 在肯尼亚研究了当地的种族偏见程度,传统观念认为肯尼亚的种族偏见程度比较强烈,然而他们在实验室中启动了被试的种族身份认同后,在之后的独裁者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中并未发现任何的种族偏见迹象。

2.职业认同的启动效应。启动方法在研究职业身份及相关规范对个人偏好的影响方面有很大优势,不同职业群体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比如银行业可能吸引了更不诚实及更风险喜好的个人,或者不同行业的收入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行为,直接比较不同职业人群的行为或者偏好通常不能确定不同职业规范之间的差异。启动方法能够让实验者在特定的职业内进行比较,实验者将某个职业的从业人员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启动条件,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没有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差异,因此启动效应就代表了该职业认同对其偏好的边际效应(Cohn et al, 2014)。

Cohn et al (2014) 首次采用启动方法来研究银行业身份认同对银行业从业员工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人们往往将银行业频频出现的财务欺诈丑闻归咎于银行业的行业文化,认为银行业的行业文化助长了欺诈行为。因此,为检验银行业的行业文化是否真的引致欺诈行为,他们在实验中启动银行员工的职业认同和相关规范,然后让银行员工进行测谎实验。结果表明,凸显银行员工相关职业认同和规范后,其在实验中的作弊行为显著增加。后续实验还发现,这种启动效应只在银行员工中被观察到,而来自其他行业的员工和学生在对他们的职业身份或与银行相关的概念启动时作弊行为并未显著增加。

大多数银行的核心业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人们通常认为银行业的过度冒险行为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为此,Cohn et al (2017) 在多家银行进行实验,使用启动方法提高银行员工的职业身份显著性,然后在风险投资任务中测度其风险偏好。结果显示,在启动被试的职业身份及相关规范后,他们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增加,这一发现同传统的银行职业规范会增进冒险行为的观点不一致,银行的职业规范并未助长过度承担风险行为。此外,还有学者从性别差异的角度研究职业认同与风险偏好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可以用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别来解释,Drupp et al (2020) 在启动科学家的职业认同后发现,男女科学家之间的风险偏好差异显著减小,而且在年龄越大的科学家中,风险偏好几乎没有性别差异。

3.宗教认同的启动效应。宗教信仰对人们的行为和偏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信仰宗教的人不太可能酗酒、非法使用药物或者从事犯罪活动,更有可能做出慈善贡献(McCleary

& Barro, 2006)。但是由于很难确定宗教身份的外生变异,因此很难衡量宗教对行为和偏好的因果效应。许多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中采用工具变量或其他识别策略来检验宗教对行为的因果效应,然而这些识别策略都有其局限性(Hungerman, 2010)。启动方法通过提高宗教身份认同的显著性在宗教影响行为的渠道中创造了外生的变异,能够很好地衡量宗教身份如何影响行为,即宗教认同的启动效应(Benjamin et al, 2016)。

Shariff & Norenzayan (2007) 在匿名独裁者博弈中通过启动一般宗教概念,检验宗教身份对利他主义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中性启动或者无启动组相比,宗教概念启动显著增加了被试的利他主义给予,而且启动效应在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中都存在。此外, McKay et al (2011) 研究发现,启动宗教概念显著增加了有向宗教组织捐款经验的被试对不公平行为的利他主义惩罚。Benjamin et al (2016) 将宗教的启动效应研究拓展到对公共物品的贡献、工作努力程度、时间及风险偏好的影响方面。研究表明,启动新教徒的宗教身份会显著增加被试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贡献额,并降低其风险厌恶程度,启动犹太教徒的宗教身份则会显著增加其工作努力程度,但在时间偏好方面没有发现启动效应。

4. 文化传统的启动效应。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对我国人群的个体偏好有着深刻的影响。启动方法为研究儒家文化如何影响经济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文化认同的启动效应可以精确地衡量儒家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Liu et al (2014) 探讨了儒家思想如何影响中国大陆被试和中国台湾被试的个人决策,在启动儒家思想后,大陆被试变得更爱冒险、损失厌恶程度更低、更不耐烦,然而台湾被试则变得更受人信任、更有耐心,说明儒家思想的启动效应在大陆和台湾被试间存在不同。Jiang & Wei (2022) 通过一个具有“软腐败”¹属性的礼物交换博弈实验,探讨儒家文化对人们软腐败行为的影响。他们在实施凸显儒家文化的启动干预后发现,启动儒家文化并不能减少送礼行为,但会使评分员的知识测试评分更加公平。

5. 社会阶层的启动效应。收入分配不均在各 国都是很重要的话题,富人掌握更多的财富、教育、医疗等资源,然而富人的道德水平和亲社会性却经常受到质疑。社会阶层与道德行为、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已经受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 的广泛关注。心理学家通常采用启动方法研究社会阶层和道德水平、亲社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显示,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个人通常比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个人道德水平更低,更有可能违反交通规则、表现出

¹ 同主要涉及政府官员并涉嫌违法犯罪的“硬腐败”不同的是,“软腐败”主要包括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徇私偏袒等,“软腐败”同样也会损害社会的公平效率,但很难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则进行约束(Jiang & Wei, 2022)。

不道德的决策倾向、在谈判中撒谎等，高社会阶层的亲社会性与同理心更弱、更不慷慨，而且这种关系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更为显著。心理学家通常认为高社会阶层表现出来的不道德行为和弱亲社会性是由于他们更为贪婪地追求经济利益和特权地位（Côté et al, 2015）。然而，Gsothbauer et al（2020）却发现，高社会阶层人群的道德水平有时可能会更高。他们首次通过对异质性人群所感知到的社会阶层身份进行外生操作，即利用被试的实际收入水平来划分高社会阶层和低社会阶层，将被试随机分配到高或低社会阶层启动条件下，然后让被试进行心理博弈（mind game）。结果显示，启动对被试所感知到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影响，而且高社会阶层的被试并没有表现出更不道德的行为，反而实际高社会阶层的被试被启动高社会阶层社会认同时其诚实水平显著比其他组别更高，他们认为这种结果的差别可能是由于之前的启动实验被试均为学生，而社会阶层对道德水平的负面影响并没有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除了研究富人的道德水平和亲社会行为，一些经济学家还使用启动方法探讨贫困身份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贫困可以通过心理渠道对人们的技能、能力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加深行为偏见和贫困（Kremer et al, 2019）。Sharafi（2019）在启动了青少年关于生活窘迫和经济困难的负面情绪后发现，现实中贫困的学生与现实中富裕的学生相比，努力程度显著降低了 25%，在实验任务中放弃的可能性也增加。这表明与贫穷有关的负面情绪会降低人们努力工作的意愿，造成动机不足，增加努力成本，进而导致努力程度和毅力水平降低。Banker et al（2020）在美国的实验室实验中发现，突出贫困身份的启动干预显著降低了学生被试从事挑战性高但收益更多的任务。此后，他们在印度孟买的贫民窟进行了实地实验室实验（lab in the field），突出贫民窟居民的贫困身份并没有影响其从事挑战性任务的积极性，但通过对被试施加积极的启动干预，²被试从事高挑战性任务的积极性显著增加。这说明突出贫困身份会抑制一个人从事具有挑战性任务的意愿，进而影响其在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此外，贫困身份的启动效应还取决于贫困身份的饱和度水平，³给予贫困人口更多的正向激励会促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可能会进一步帮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Bartoš et al（2021b）以乌干达的农民为实验对象探讨了贫困身份对时间偏好的影响。为了避免流动性、财富、金融市场准入和健康等混淆因素的影响，他们使用启动操纵来激发农民对贫困相关问题的思考。结果发现，思考贫困导致农民花费在娱乐上的时间多了 1.7 倍，而且还提前了 21 分钟进行娱乐活动，说明贫困思考会增加农民提前娱乐和延迟工作的偏好，与

² 积极的启动干预为口头自我肯定激励。

³ 贫困身份的饱和度水平体现在是暂时地感到贫困还是持久地经历贫困。

贫困相关的启动直接影响农民的时间偏好。

6.罪犯认同的启动效用。犯罪不仅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还会产生高额的经济成本,例如美国 2017 年的个人和财产犯罪成本高达 2.6 万亿美元 (Miller et al, 2021)。因此,探究人们犯罪的原因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Becker (1968) 开创性地提出个人犯罪的决定是对预期物质利益和惩罚成本的权衡,然而,社会和心理学家普遍认为犯罪决定还取决于人们对道德和自我形象的考虑。Cohn et al (2015a) 将社会认同理论应用于犯罪情境,认为囚犯有道德身份和罪犯身份,违反规则的行为会给道德身份带来成本,而几乎不会让罪犯身份受到影响,所以更强的罪犯身份认同会增加违反规则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识别罪犯认同对违反规则行为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由于罪犯和非罪犯之间存在很多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差别,所以不能直接对二者直接比较。为此, Cohn et al (2015a) 采用启动方法提高了囚犯罪身份的显著性,然后让囚犯私下抛掷硬币。⁴与对照组的囚犯相比,启动罪犯身份的囚犯在抛硬币任务中作弊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而这一启动效应在普通公民中并未发生,说明罪犯身份显著性的增加确实会增加囚犯违反规则的可能性。

除了了解人们犯罪的原因,研究监禁如何影响囚犯并促进他们改过自新和重新融入社会对预防后续犯罪活动及累犯也有重要意义。Balafoutas et al (2020) 在希腊的两所监狱做了一系列信任博弈、囚徒困境及平等等价性检验⁵实验,结果发现,囚犯对外部群体的信任程度、互惠性和合作性显著低于对内部群体,⁶而且监禁时间越长,囚犯的亲社会性越低。此后,他们采取了一种简单的启动干预,要求囚犯反思他们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及其对他们的影响。结果表明,这种启动干预显著增加了囚犯对外部群体的信任程度、互惠性和合作性,这一变化说明启动干预可以促进囚犯改过自新及重新融入社会。

7.环境认同的启动效应。鉴于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许多关于公共物品贡献的经济研究都特别提到保护自然环境,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对绿色偏好和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 (Schwirplies & Ziegler, 2016)。与种族、宗教、职业等社会认同相比,环境认同是比较模糊的概念,但与环境保护规范非常相关。近年来,环境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环境认同的启动效应, Engler et al (2019) 结合启动方法和陈述选择实验 (stated choice experiment), 在德国研究了启动环境认同对绿色偏好的影响,发现环境认同对绿色偏好有非线性的启动效应,启动效应随着环境认同感的增加而增加,对于没有环境认同感或环境认同感很低的被试而

⁴ 只有在抛得“人头”时被试才会获得奖励。

⁵ 平等等价性检验是由Kerschbamer (2015)提出的一种对分配偏好类型进行分析的方法。

⁶ 外部群体是指监狱外的人,内部群体指监狱中的其他囚犯。

言,启动效应为零。Bimonte et al (2020) 的研究衡量了积极启动和消极启动⁷对人们购买环保智能手机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的影响,结果表明,启动环保行为显著提高了人们购买环保智能手机的支付意愿,而且积极启动比消极启动更有效。Bonan et al (2021) 在一项关于家庭节能的大型随机实地实验中,通过突出被试过去的环保行动来启动环境认同,然而启动环境认同对家庭节能行为总体上是无效的,只在过去具有较高基准能耗和环保行为的被试中存在启动效应。Filippini et al (2021) 在向购买摩托车的消费者介绍了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并展示了空气污染的图片后,消费者转向购买电动车的比例显著增加,说明环境启动能够有效促进消费者选用环保型替代品。

(二) 社会认同对感知规范的启动效应

上述研究只反映了启动社会认同引发的行为反应能够揭示相关规范的信息,然而并没有直接衡量启动社会认同对感知规范的影响。为研究社会身份显著性如何影响对外群体歧视社会规范的感知, Barr et al (2018) 在实验中分别启动被试的国籍社会认同及人工设置的社会认同后观察被试的歧视行为。结果表明,不同国籍身份的被试对歧视行为恰当性的感知存在显著不同。而且在两种社会认同的启动处理中,被试认为基于国籍的歧视比基于人工设置的社会身份的歧视更不恰当,而且在人工设置的启动环境下被试的歧视行为出现得更多。因此,当社会规范反对歧视时,外群体歧视就会变得更少。采用同样的方法, Chang et al (2019) 发现,政治身份的显著性可以唤起不同的社会规范。个人的主要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对再分配政策社会适当性的认知,进而解释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再分配行为上的差异,即启动政治身份后的民主党人更喜欢平等的再分配方案,而共和党人在启动后则更倾向于拒绝平等的再分配方案。

(三) 社会认同对认知技能的启动效应

人们的认知技能通常被认为是外生的,然而许多研究表明人们的社会认同也会影响其认知技能,具体而言,社会认同会影响人们的学习和智力表现。Akerlof & Kranton (2002) 提供的证据表明,学生的社会认同会影响其人力资本的实现,诸如“书呆子”“运动员”“领导群体”这类的社会类别标签会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学生会以其社会认同来选择学习的努力程度。有些研究种族刻板印象对认知技能影响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启动种族认同后的非裔美国人在智力测试中分数比控制组显著低,而当亚裔身份显著性增强时,亚裔美国人的考试成绩显著更高(Steele & Aronson, 1995; Shih et al, 1999)。Spencer et al (1999) 在数学考试前

⁷ 积极启动为告知被试环保行为可以改善环境质量,消极启动为告知被试环保行为可以防止环境恶化。

提前告知女性被试,她们在之后的数学考试中的成绩往往不如男性,与未提前告知女性被试性别差异的对照组相比,女性被试的考试分数下降了 50%左右。Dee (2014) 在启动了学生运动员身份认同后发现,与非学生运动员相比,启动显著降低了学生运动员的认知表现。

在研究社会地位对认知技能的启动效应方面,Hoff & Pandey (2014) 研究了印度种姓身份对认知技能的启动效应。他们采用了公开每个学生被试种姓身份的启动机制,结果显示,与高种姓被试与低种姓被试分开的种姓隔离组和未启动组相比,在混合种姓组中提高种姓身份的显著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低种姓被试学习新技能的能力。Delis et al (2021) 在一项随机问卷实验中,通过引导被试思考其个人经济状况来进行启动干预,结果发现,启动个人经济状况使得贫困个体的财务知识得分下降了 3.7 倍,但高收入个体的财务知识得分在启动干预后反而上升了。Delis et al (2021) 认为贫困身份会给人们带来焦虑感和羞耻感,进而降低人们的财务认知能力。Afridi et al (2015) 探讨了我国户籍制度对学生认知技能的影响,分析了户籍身份对学生在激励性认知任务中的启动效应。相对于本地城市学生而言,启动学生被试的户籍显著性降低了农村移民学生的认知表现,从而显著降低了他们在计件工资制度下收入分配的相对排名。然而启动户籍社会认同在锦标赛工资制度下并未对农村移民学生的认知表现产生影响,说明引入竞争可以缓解由户籍身份认同带来的负面启动效应。

(四) 启动方法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应用

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领域,启动方法还可以用来识别诸如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和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行为的因果效应,传统的实证方法在检验某一经济变量的因果效应时存在诸多局限,例如在检验逆周期风险厌恶方面,采用实际的市场数据可能难以避免因果识别的内生性问题,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同时受许多难以衡量的因素所影响。例如资产价格的下跌通常与主观预期资产收益、资产价格波动性、整体金融财富、习惯的变化以及可能与资产价格相关或不相关的背景风险的变化有关,因此从实际资产持有量推测风险厌恶程度极具挑战 (Cohn et al, 2015b; Cohn & Maréchal, 2016)。

Cohn et al (2015b) 使用启动方法检验了金融市场趋势对金融专业人士风险偏好的影响。他们在实验中分别启动金融专业人士对股市繁荣或者萧条的思索,然后在一系列具有财务风险的简单投资任务中衡量其风险厌恶程度,直接剔除其他混淆因素的影响,结果发现启动股市萧条组的被试比启动股市繁荣组的被试更加恐惧和厌恶风险,而且恐惧程度越高,对资产的投资程度显著越低,表明恐惧在逆周期风险规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检验 Cohn et al (2015b) 研究结果的普适性,Alempaki et al (2019) 采用其启动实验在非限定为金融专业人士的更广泛的人群中测度了金融市场趋势对被试风险偏好的启动效应,然而,在启动被试

关于股市繁荣或萧条的思索后,被试并没有产生恐惧的情绪反应,其风险偏好也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反周期风险厌恶只出现在金融专业人士中,并不适用于更为广泛的群体。为识别市场环境对资产定价的影响,Newell & Page (2017) 在交易前分别启动了实验被试对市场的繁荣想象和萧条想象。在后续资产市场实验中发现,繁荣启动下的市场具有更高的清算价格和更为严重的资产错误定价,萧条启动下的市场泡沫显著减少。此外,与萧条启动相比,繁荣启动下的被试对市场的预测能力更弱。

四、启动研究的实验设计过程及面临的争议

(一) 启动实验设计步骤

根据现有的使用启动方法的实验经济学文献,大多数实验旨在研究启动干预对人们行为、偏好的因果效应,因此经济学中的启动实验设计与传统的实验设计有所不同,通常是将启动方法与传统的实验室实验或实地实验相结合。经济学中的启动实验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步骤:确定研究主题、选择实验样本、实施启动操纵、操纵检验(manipulation check)、开展后续实验任务、安慰剂检验(Cohn et al,2014)。例如, Benjamin et al (2010) 为研究种族认同对个人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影响,以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为实验对象,让被试填写个人身份背景信息的问卷来启动被试种族身份的心理概念,在后续的实验任务中,他们让被试完成跨期选择实验和风险决策实验任务,以此来估计种族认同对被试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的启动效应。Cohn et al (2014) 探讨了银行职业认同对道德行为的启动效应,他们选择的实验样本为银行员工,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启动银行员工的职业认同,实施完启动操纵后又让被试完成填词任务以进行操纵检验,然后让被试参加匿名抛硬币任务来衡量被试的道德水平。为确保银行职业认同的启动效应只存在于银行员工中,他们还以非银行员工和学生为实验对象进行安慰剂检验,以避免其他混淆因素的影响。

本节将结合现有的经济学启动实验详细介绍每个步骤的设计细节和注意事项。

1.确定研究主题。基于启动干预的经济学实验首先要明确实验的研究主题,研究主题的选择决定了实验启动机制和后续实验任务的设计策略。通常而言,选择研究主题的出发点有两个:

(1) 检验现有的理论。现有的文献大多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认同理论和经济学的内生偏好理论来确定研究主题。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社会身份会决定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内生偏好理论认为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等会影响个人偏好,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启动人们的某类社会认同来检验其对个人偏好和经济行为的作用机制。此外,还可以从现

有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入手, 检验经济变量对行为的因果效应。比如 Cohn et al (2015b) 就通过启动金融市场趋势检验了逆周期风险厌恶的宏观经济理论。

(2) 调查经济和社会现象。经济和社会中充斥着大量难以用传统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的现象, 比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贫富差距、犯罪、暴力等。首先, 由于伦理和经费等原因, 很难采取大规模的实地实验。其次, 几乎不可能对这些现象进行外生的干预和操纵。启动方法可以很好地用来研究这类经济和社会现象, 通过外生地启动种族、性别、社会阶层、犯罪经历、暴力创伤等, 探讨这些社会身份和经历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机制。比如, Depetris-Chauvin et al (2020) 通过调查非洲足球队胜利对种族认同的影响发现, 国家足球队胜利启动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与比赛前相比, 受访者在比赛胜利后对本种族的认同感下降了 37%, 但对其他种族的信任感增加了 30%, 国家足球队胜利成功削弱了种族认同感, 但增加了国家认同感, 从而改善了人们对其他种族的態度并显著减少了种族间的暴力行为。Callen et al (2014) 为了探讨战争和社会冲突带来的心理创伤是否会对风险偏好造成影响, 他们在阿富汗对来自不同地区的平民进行了启动实验, 所采取的启动干预是让被试回想一次诸如炸弹袭击的恐怖经历, 然后让被试在不同风险组合中选择彩票, 并与让被试回忆快乐和中性事件的其他组别相比较, 从而研究战争创伤对风险偏好的启动效应。

2. 选择实验样本并进行随机分组。启动方法的实验目的一般是为了探究社会认同对行为的影响, 或者是调查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实验样本的选择与传统的实验样本选择也有很大不同。启动实验的实验样本通常不是高校学生被试, 而是拥有特定社会身份或经历的人群。例如在研究特定职业身份的社会认同对行为的启动效应时, 需将样本限定在该职业的从业人员里; 在研究社会阶层对社会偏好的启动效应时, 样本范围应包括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员; 在研究特定社会经历对行为的启动效应时, 同样应选取有相关经历的被试群体 (Callen et al, 2014)。此外, 在确定实验样本时应保证最小可测效果 (minimum detectable effect, MDE) 所需的样本量 (Duflo et al, 2008)。

由于启动实验通常为被试间设计 (between-subjects design), 所以在确定实验样本后, 应对样本进行随机分组, 分别设置启动干预组和控制组。随机分组方法主要采用简单随机和分层随机法, 简单随机指对实验样本直接进行随机分组, 例如可以采用计算机生成随机数的方法进行简单随机分组。分层随机即按人口统计特征或相关经济变量进行分层随机, 比如, Afridi et al (2015) 在中国进行的研究户籍身份对认知技能的启动效应实验中, 对被试按照性别、年级、班级和户口类型进行分层随机分组。在随机分组后, 为了检验分组的随机性, 需对分组结果进行平衡性检验 (balance check), 又称随机性检验 (randomization check) (Bruhn

& McKenzie, 2009)。

3.实施启动操纵。实施启动操纵是启动实验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启动干预包括自动启动 (automatic priming) 和有意识启动 (conscious priming), 自动启动指被试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接受启动, 例如, 闪动的图片或非常简短的文字, 以至于被试没有意识到。有意识启动是指被试有充分的意识, 例如, 让被试阅读一个故事或单词。经济学中的启动实验主要是有意识的启动, 让被试有意识地暴露在一定的刺激下。

经济学启动实验实施的启动操纵主要有让被试阅读故事或文字、回答问卷和观看图片等方式, 来提高某一社会身份或情绪的显著性。比如, Gilad & Kliger (2008) 让两组被试分别阅读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的故事来启动被试的风险态度。Gsothbauer et al (2020) 通过让被试阅读关于社会地位的文字来凸显被试的高社会阶层身份和低社会阶层身份。Cohn et al (2017) 让被试回答关于职业身份的问卷来启动他们对银行员工身份的社会认同。Cohn et al (2015b) 用表示金融市场趋势的图表来刺激被试, 启动被试对于股市繁荣或萧条的思索。此外, 研究者还可以采用音乐、视频、面对面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实施启动操纵。需要注意的是, 研究者需要结合研究主题和实验情境选择合适的启动操纵方式。

4.操纵检验。为了确定启动操纵的有效性, 在实施完启动操纵后, 研究者需要对操纵效果进行检验。操纵检验可以确保被试对启动干预做出预期的反应, 一个典型的操纵检验包含一个或多个问题, 旨在了解每个被试对所暴露的刺激的反应。如果操纵检验是成功的, 即干预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之间的回答有显著的差异, 则说明被试对启动过程中的刺激产生了应有的反应。比如 Cohn et al (2014, 2017) 在启动银行员工身份认同后, 让被试完成单词拼写任务, 启动操纵后的被试回答“banker”的概率显著比控制组多, 说明启动操纵是成功的。Gsothbauer et al (2020) 在提高社会阶层身份显著性后, 让被试回答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 结果是启动高社会地位 (primed-rich) 被试回答的社会阶层显著比启动低社会地位 (primed-poor) 被试高, 说明启动操纵成功地改变了被试对其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估。

5.开展后续实验任务。经济学中的启动实验主要是研究对个人经济行为、偏好的启动效应, 因此在成功完成启动操纵后需让被试进行后续的实验任务来测量被试在行为、偏好方面对启动刺激的反应。研究者需要依据研究主题与相关理论设计检验启动效应的实验任务, 如果要检验对个体偏好的启动效应, 研究者应让被试完成跨期选择实验、风险决策实验等任务 (Benjamin et al, 2010)。为了衡量启动操纵对社会偏好的影响, 研究者可以让被试完成诸如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囚徒困境博弈、公共物品博弈等实验任务, 来检验被试在启动干预后其利他主义给予和合作水平是否显著变化 (Shariff & Norenzayan, 2007)。如果要研究

启动操纵对个人道德水平的影响,研究者可以让被试完成匿名抛硬币任务或者心理博弈任务来观测被试在启动干预后个人作弊行为是否显著变化 (Gsothbauer et al, 2020)。在研究启动社会认同对认知技能影响的实验中,一般采取走迷宫、做计算题、做智力测试题等任务 (Hoff & Pandey, 2014)。

6. 安慰剂检验。完成上述实验步骤之后,为了检验启动效应是否只在特定身份的人群中存在,一般还需进行安慰剂检验。启动实验中的安慰剂检验主要通过在不同社会身份的被试间进行同样的启动操纵,来检测是否存在与处理组相同的启动效应。Cohn et al (2014, 2017) 在检验启动银行员工身份认同是否会导致被试更加不诚实及更风险偏好的实验中,还对非银行员工和学生做了同样的启动操纵,结果并未发现有同银行员工一样的启动效应。Cohn et al (2015a) 的实验说明启动罪犯的犯罪身份会让他们更加不遵守规则,然而非罪犯的普通居民在接受启动操纵后并未出现更多的不诚实行为,因此这一效应只适用于具有犯罪身份的个体。

(二) 启动研究面临的争议

1. 实验结果的可复制性。启动方法虽然在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近年来由于几项著名的启动研究结果的失败复制,许多学者开始质疑启动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Yong, 2012)。例如, Bargh et al (1996) 研究发现,偶然激活老年人刻板印象会产生与刻板印象群体相关的行为。他们对老年人进行带有刻板印象词语的启动,发现受到启动的老年人与未受到启动干预的老年人比从实验室走到电梯时间更长。但 Doyen et al (2012) 对其实验进行复制没有发现类似的结果。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 复制了 2008 年三个顶级心理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所报告的 100 个实验,结果表明,虽然按照作者提供的原始材料来进行实验重复,但是仅有 36% 的重复实验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Weingarten et al (2016) 在进行偶然出现的与动作有关的启动词对任务表现的影响研究中发现,虽然实验结果总体上显著,但是可能存在实验可复制性较差的隐患。Payne et al (2016) 进行了六项关于启动对被试在模拟 21 点游戏中下注的影响的实验,他们认为一些著名的行为启动研究被证明难以复制的原因是复制者大多是使用了动机较弱的被试参与了实验设计,同时他们认为行为启动具有被试无意识行为的关键特征。但是 Shanks (2017) 对该实验的复制时巧妙设计了不区分自动过程与受控过程的实验,而实验结果仍然再现了 Payne et al (2016) 的实验结果,表明启动形式的关键特征并不在于被试的无意识行为。

而另一种关于实验结果难以复制的解释是人的潜意识在现实中无法执行意识所能执行的所有高级功能 (Bargh, 2014)。同时很多证据表明潜意识是狭隘与短暂的,很难提供可靠的

发生机制 (Newell & Shanks, 2014)。2002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 (Kahneman) 提出, 虽然他对启动研究的失败复制持怀疑态度, 复制者可能并不了解启动效应观察条件的微妙之处, 实验设计的细微变化就会改变启动效应。但他还是建议知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建立启动结果复制链, 研究人员除了披露原始数据和代码外, 还应提供独立复制所需的所有材料 (Yong, 2012)。此外, Rivers & Sherman (2018) 进一步强调了实验设计对于统计功效和启动效应可靠性的重要性。

2. 伦理和道德问题。启动干预在实地实验中的应用越来越多, 比如 Kessler & Milkman (2018) 分析了美国红十字会进行的两项随机实地实验, 目的是向前几年未提供捐款的人员募集捐款, 结果表明, 启动亲社会身份 (慈善机构的前捐赠者或当地社区的成员) 显著增加了捐赠的可能性。Bonan et al (2021) 和 Filippini et al (2021) 在关于环境保护的随机实地试验中, 通过启动人们的环境认同显著增加了人们的环保行为和绿色偏好。这些应用表明, 启动干预可以作为一种成本有效的助推手段应用于公共政策设计中, 重构人们的选择框架。然而这些启动干预通常是在没有经人们同意而且是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样激发人们的心理概念会带来一系列伦理和道德问题。如果实施启动干预的机构并不是出于善意的目的, 比如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企业经常是为了最大化自身利润而非为了消费者利益, 公共部门的助推政策有时也是有害的, 可能会损害人们的尊严和自主权。

同样应注意战争、暴力等负面信息启动干预对被试的影响。Callen et al (2014) 在阿富汗地区使用启动方法研究了战争或社会冲突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其中启动干预是被试回想一次诸如炸弹袭击的经历。在实施启动干预时应该特别注意被试的心理健康, 避免回想袭击经历对被试产生二次伤害。Delgado et al (2009) 在研究暴力对非人性化启动效应中使用含有暴力信息的图片或视频对被试进行启动干预, 结果表明, 暴力可以引发对外群体的非人类感知。在此类实验中应时刻关注被试的心理健康, 避免对实验后被试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而对于未成年人的启动干预研究也应当特别注意, 避免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影响。Zheng & Zhang (2016) 在关于电脑游戏暴力对儿童攻击性水平的启动效应的研究中, 使用 220 名儿童接受电脑游戏暴力启动干预, 结果发现, 性别和特质攻击性都会影响玩暴力视频游戏的儿童的攻击性。因此, 在实施启动干预的政策设计方面, 应尽量避免负面信息启动干预对被试的身心健康造成消极影响, 产生伦理和道德问题, 应当提高启动干预的透明度, 并接受公众的监督 (Sunstein, 2015; Thaler, 2018)。

五、总结与展望

启动方法通过情境操纵激活某一特定的心理概念,能够精确地衡量启动概念对被试行为决策的影响,并且可以干净地识别出启动概念的因果效应。鉴于启动方法的以上优点,启动方法的使用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目前使用该方法的研究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说明为什么要用启动方法来研究社会认同对行为的因果效应,然后对经济学启动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介绍,继而系统梳理了启动方法在经济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后对启动研究的实验设计过程及面临的争议进行了阐述和总结。

(一) 研究总结

启动方法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流行的工具,在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启动方法在研究劳动就业歧视问题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有助于探寻减少甚至消除歧视的方法,为提高不同身份背景员工的合作和协调水平提供了启示。此外,启动方法还可以被用来研究不同职业身份对个人偏好的影响,识别不同职业人群个体偏好的异质性,对于防范职业风险、提升职业道德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现有的一些研究探讨了贫困身份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的影响、贫困心理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技能,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道德水平和社会偏好,有助于研究贫富差距的形成机制、探索消除贫困的新路径。在公共经济学领域,启动研究结合随机实地实验展示了在实践中如何实施启动干预以鼓励慈善捐赠等亲社会行为。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启动实验为识别因果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能够检验诸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虽然国际上启动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非常广泛,但在我国开展启动实验研究还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一是我国使用启动方法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应用范围窄,可以借鉴的国内文献少。二是启动方法是一种主要来源于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而在我国目前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程度不足,启动方法在国内尚未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三是在我国开展的启动实验如何创新性地研究中国问题,融合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体制、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因素,而非仅仅将国外的研究换一个被试群体,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二) 未来研究展望

在中国进行启动实验研究有以下三点必要性:首先,在制度上,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启动干预是一种低成本且高效的(cost-effective)政策工具,可以促使人们的行为更符合公

共利益，比如在健康、储蓄、纳税、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启动实验研究可以为启动干预政策设计提供依据。其次，在理论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独特的政治体制、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国内的启动实验研究结果可能有别于国外的研究结果，其理论机制可能有所不同，这为丰富经济理论和实践带来新的证据和视角。最后，在应用上，启动方法可以用来研究我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比如新冠疫情的冲击对居民个体的行为影响等。本文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现实背景，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研究展望。

1. 聚焦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在社会认同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方面，可以结合我国的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检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此外，不同的宗教身份、职业身份、社会阶层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也非常值得关注。我国的慈善捐赠主要以企业捐赠为主，个人捐赠占比低，可以采用启动方法研究我国高收入人群的慈善捐赠行为和社会偏好，对我国的个人低慈善捐赠意愿做出解释。其次，在社会认同对认知技能的影响方面，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天然存在割裂，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户籍身份对认知技能的影响机制。此外，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还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留守儿童，未来可以探究留守儿童身份认同对认知技能的影响。再次，在研究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方面，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启动方法可以用来探究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机制，以及这些差距对人们经济行为带来的影响，探索消除这些差距对人们行为和认知技能影响的激励机制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

2. 拓宽应用范围，创新研究领域。我国目前的经济学启动研究主要围绕传统文化和户籍制度展开，研究范围较窄，而国际上启动方法在经济学多个领域均已得到充分应用，未来应拓宽启动方法的应用范围，探讨各类身份认同对经济行为、感知规范和认知技能的影响。此外，未来还可以创新研究领域，比如可以研究宏观经济形势变动、国际政治动荡或广泛传播的疾病对人们行为决策的影响。国际上就有学者研究了新冠疫情这一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健康和经济冲击对人们心理的影响。Bartoš et al (2021a) 在捷克采用启动方法提高了新冠疫情的凸显性，结果发现，被试在独裁者博弈及毁灭之乐博弈 (the joy-of-destruction game) 中对来自欧盟、美国和亚洲的外国人分配的金额显著下降，说明启动新冠疫情确实对个体分配行为产生影响。此外，Adena & Harke (2021) 还研究了新冠疫情对亲社会性行为的影响，在处理组提及新冠疫情对儿童的负面影响，这一启动干预显著增加了人们对慈善机构的公益捐赠，而且受新冠疫情影响更严重地区的人们捐赠额更多。当前我国面临的疫情形势复杂严峻，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逆全球化态势加剧，我国学者也可以借助启动方法研究外部环境变动对

人们行为决策的影响。

3. 丰富研究形式，充当公共政策的“试验田”。我国目前的经济学启动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研究形式呈现单一化。未来可以将启动方法同人工实地实验（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框架实地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相结合，以“真实”的被试为研究对象，而非仅以标准化的学生为被试池。国际上的启动研究大多采用具有特定社会认同或经历的“真实”被试，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某一社会认同或经历的启动效应，而且具有更强的外部有效性。此外，国际上已开始将启动方法同随机实地实验（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相结合，探究启动干预对慈善、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Kessler & Milkman,2018; Filippini et al,2021）。国内学者也可以尝试开展启动干预的随机实地实验，研究启动干预对亲社会行为、健康行为、投资行为、公共政策遵从度等的助推作用，重塑人们的选择框架，使人们的行为更符合公共利益，并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Adena, M. & J.Harke(2022) ,“Covid-19 and pro-sociality: How do donors respond to local pandemic severity, increased salience, and media coverage?”,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5(3): 824-844.
2. Afridi, F. et al(2015), “Social identity and inequality: The impact of China’s hukou syste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3:17-29.
3. Akerlof, G.A. & R. E.Kranton (2002), “Identity and schooling: Some lessons for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4):1167-1201.
4. Akerlof, G.A. & R.E.Kranton(2000), “Economics and ident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3):715-753.
5. Alempaki, D. et al(2019), “On the priming of risk preferences: The role of fear and general affect”,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75(A):102137.
6. Anderson, R.W. et al(2017), “Jewish persecutions and weather shocks: 1100-1800”, *The Economic Journal* 127(602):924-958.
7. Andreoni, J. & L.Vesterlund(2001), “Which is the fair sex? Gender differences in altruism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1):293-312.
8. Balafoutas, L. et al(2020), “Rehabilitation and social behavior: Experiments in prison”, *Games*

- and Economic Behavior* 119:148-171.
9. Banker, S. et al(2020), “Poverty identity and preference for challenge: Evidence from the US and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76(C):102214.
 10. Bargh, J.A.(2014), “Our unconscious mind”, *Scientific American* 310(1):30-37.
 11. Bargh, J.A. et al(1996), “Automaticity of social behavior: Direct effects of trait construct and stereotype activation on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2):230-244.
 12. Barr, A. et al(2018), “On the social inappropriateness of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64:153-164.
 13. Bartoš, V. et al(2021a), “Covid-19 crisis and hostility against foreign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37(C):103818.
 14. Bartoš, V. et al(2021b),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poverty on time preferences”, *The Economic Journal* 131(638):2357-2382.
 15. Becker, G.S. & C.B.Mulligan(1997), “The endogenous determination of time prefer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3):729-758.
 16. Becker, G.S.(1968),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2):169-217.
 17. Benjamin, D.J. et al(2010), “Social identity and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4):1913-1928.
 18. Benjamin, D.J. et al(2016), “Religious identity and economic behavior”,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8(4):617-637.
 19. Berge, L.I.O. et al(2015), “How strong are ethnic preferenc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1715.
 20. Bimonte, S. et al(2020), “Nudg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web experiment on priming and WTP”,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63(4):651-668.
 21. Bolton, G. & E.Katok(1995), “An experimental test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beneficent behavior”, *Economics Letters* 48(3-4):287-292.
 22. Bonan, J. et al(2021), “Can social information programs be more effective?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identity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08:102467.

23. Bonin, H. et al(2007), “Cross-sectional earnings risk and occupational sorting: The role of risk attitudes”, *Labour Economics* 14(6):926-937 .
24. Bowles, S.(1998), “Endogenous preferences: 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markets and other economi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 (1):75-111.
25. Brown-Kruse, J. & D.Hummels(1993), “Gender effects in laboratory public goods contribution: Do individuals put their money where their mouth i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2(3):255-267.
26. Bruhin, A. et al(2010), “Risk and rationality: Uncovering heterogeneity in probability distortion”, *Econometrica* 78(4):1375-1412 .
27. Bruhn, M. & D.McKenzie(2009), “In pursuit of balance: Randomization in practice in development field experime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4):200-232.
28. Buurman, M. et al(2012),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Risk averse and altruistic? ”,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83(3):279-291.
29. Callen, M. et al(2014), “Violence and risk preferenc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fghanist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123-48.
30. Chang, D. et al(2019), “Rhetoric matters: A social norms explanation for the anomaly of framing”,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16:158-178.
31. Chen, Y. & S.X.Li(2009), “Group identity and social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1):431-57.
32. Chen, Y. et al(2014), “Which hat to wear? impact of natural identities o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84:58-86.
33. Cohn, A. et al(2014), “Business culture and dishonesty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Nature* 516 (7529): 86-89.
34. Cohn, A. et al(2015a), “Bad boys: How criminal identity salience affects rule vio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4):1289-1308.
35. Cohn, A. et al(2015b), “Evidence for countercyclical risk aversion: An experiment with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2):860-885.
36. Cohn, A. et al(2017), “Do professional norm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favor risk-taking?”,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0(11):3801-3823.

37. Cohn, A. & M.A. Maréchal (2016), "Priming in economic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2:17-21.
38. Côté, S. et al (2015), "High economic inequality leads higher-income individuals to be less generou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52):15838-15843.
39. Daly, M. & M. Wilson (1988),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and family homicide", *Science* 242(4878):519-524.
40. Dee, T.S. (2014), "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student-athlete", *Economic Inquiry* 52(1):173-182.
41. Delgado, N. et al (2009), "Priming effects of violence on inhumaniza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2(6):699-714.
42. Delis, M. et al (2021), "Economic condition and financial cognitio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123:106035.
43. Depetris-Chauvin, E. et al (2020), "Building nations through shared experiences: Evidence from African footbal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 (5):1572-1602.
44. Doyen, S. et al (2012), "Behavioral priming: It's all in the mind, but whose mind?". *PLoS One* 7(1):e29081.
45. Drupp, M.A. et al (2020),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he gender gap in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field experiments with scient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70:418-432.
46. Duflo, E. et al (2008), "Using randomization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A toolkit", in: T. P. Schultz & J. Strauss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lsevier.
47. Eckel, C.C. & P.J. Grossman (1998), "Are women less selfish than men? Evidence from dictator experim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108(448):726-735.
48. Eckel, C.C. & P.J. Grossman (2001), "Chivalry and solidarity in ultimatum games", *Economic Inquiry* 39(2):171-88.
49. Eckel, C.C. & P.J. Grossman (2002), "Sex differences and statistical stereotyping in attitudes toward financial risk",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3(4):281-295.
50. Engler, D. et al (2019), "The causal effect of religious and environmental identity on green preferences: A combined priming and stated choice experiment", VFS Annual Conference 2019 (Leipzig): 30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 Democracy and Market Economy 203610, No. F09-V3.

51. Fehr, E. & K.Hoff(2011), “Introduction: Tastes, castes and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society on preferences”, *The Economic Journal* 121(556):F396-F412.
52. Filippini, M. et al(2021), “Nudging adop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Evidence from an information-based intervention in Nepal”,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97:102951.
53. Gilad, D. & D.Kliger(2008), “Priming the risk attitudes of professionals in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Review of Finance* 12(3):567-586.
54. Grosfeld, I. et al(2020), “Middleman minorities and ethnic violence: Anti-Jewish pogroms in the Russian empir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7(1):289-342.
55. Gsottbauer, E. et al(2020) ,“Social class and (un)ethical behavior: Causal versus correlational evidence”,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Working Paper, No.2020-10.
56. Henrich, J. et al(2001),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u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73-78.
57. Henrich, J.(2004), “Cultural group selection, coevolutionary processes and large-scale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3(1):3-35.
58. Hoff, K. & P.Pandey(2014), “Making up people—The effect of identity on performance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6:118-131.
59. Holt, C.A. & S.K.Laury(2002), “Risk aversion and incentive effe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5):1644-1655.
60. Hungerman, D.M.(2010),“Rethinking the study of religious markets”, in: R.M.McCleary(e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1. Jiang, S. & Q.Wei(2022), “Confucian culture, moral reminder, and soft corruption”,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98:101875.
62. Johnson, M. K. et al(2010), “Priming Christian religious concepts increases racial prejudic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119-126.
63. Keane, M.M. et al(1991), “Evidence for a dissociation between perceptual and conceptual priming in Alzheimer's diseas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05(2):326-342.
64. Kerschbamer, R.(2015), “The geometry of distributional preferences and a non-parametric identification approach: The equality equivalence tes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6:85-103.

65. Kessler, J.B. & K.L.Milkman(2018), “Identity in charitable giving”, *Management Science* 64(2):845-859.
66. Kremer, M. et al(2019), “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B.D.Bernheim et al(eds), *Handbook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pplications and Foundations*, Elsevier.
67. Lewis, G.B. & S.A.Frank(2002), “Who wants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2(4):395-404.
68. Liu, E.M. et al(2014), “Confucianism and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lab experiments in Taiwan and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04:106-122.
69. MacGregor, D. et al(1994), “Perceived risks of radioactive waste transport through Oregon: Results of a statewide survey”, *Risk Analysis* 14(1):5-14.
70. Mack, D. et al(1971), “Sex role identification and behavior in a re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 game”, *Psychonomic Science* 24(6):280-282.
71. Malmendier, U. & S.Nagel(2011), “Depression babies: Do macroeconomic experiences affect risk tak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1):373-416.
72. McCleary, R.M. & R.J.Barro(2006), “Religion and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49-72.
73. McKay, R. et al(2011), “Wrath of god: Religious primes and punishment”,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8(1713):1858-1863.
74. Meux, E.P.(1973), “Concern for the common good in an n-person ga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3):414-418.
75. Miguel, E. et al(2004), “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4):725-753.
76. Miller, T.R. et al(2021), “Incidence and costs of personal and property crimes in the USA, 2017”, *Journal of Benefit-Cost Analysis* 12(1):24-54.
77. Newell, A. & L.Page(2017), “Countercyclical risk aversion and self-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s in experimental asset markets”, QUT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050.
78. Newell, B.R. & D.R.Shanks(2014), “Prime numbers: Anch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behavior priming”, *Social Cognition* 32(S):88-108.
79. Nowell, C. & S.Tinkler(1994),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on the provision of a public good”,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5(1):25-36.

80. 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2015), “Estimat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Science* 349(6251):aac4716.
81. Orbell, J. et al(1994), “Trust, social categories, and individuals: The case of gender”,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8(2):109-128.
82. Palacios-Huerta, I. & T.J.Santos(2004), “A theory of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endogenous preferenc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3-4):601-627.
83. Payne, B.K. et al(2016), “Replicable effects of primes on human behavi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5(10):1269-1279.
84. Rapoport, H. & J.P.Vidal(2007), “Economic growth and endogenous intergenerational altruis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1(7-8):1231-1246.
85. Rivers, A.M. & J.Sherman(2018),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the reliability of priming effects: Reconsidering the ‘train wreck’ ”, *PsyArXiv*, doi:10.31234/osf.io/r7pd3.
86. Schwirplies, C. & A.Ziegler(2016), “Offset carbon emissions or pay a price premium for avoiding them?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motiv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activities”, *Applied Economics* 48 (9):746-758.
87. Shanks, D.R.(2017), “Mis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priming controversy: Comment on Payne, Brown-Iannuzzi, and Loersch(2016)”,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6(8):1216-1222.
88. Sharafi, Z.(2019), “Poverty and perseverance: The detrimental effect of poverty on effort provision”,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471275>.
89. Shariff, A.F. & A.Norenzayan(2007), “God is watching you: Priming god concepts in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in an anonymous economic gam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9):803-809.
90. Shih, M. et al(1999), “Stereotype susceptibility: Identity salience and shifts in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1):80-83.
91. Spencer, S.J. et al(1999), “Stereotype threat and women’s math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5(1):4-28.
92. Spigner, C. et al(1993),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 of risk associated with alcohol and drug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omen & Health* 20(1):87-97.
93. Steele, C.M. & J.Aronson(1995), “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intellectual test performance of african america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5):797-811.

94. Sunstein, C.R.(2015), “Nudging and choice architectur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32(2):413-450.
95. Tajfel, H. & J.Turner(1979) ,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Austin & S.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Brooks Cole.
96. Tanaka, T. et al(2010), “Risk and time preferences: Linking experimental and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Vietna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1):557-571.
97. Thaler, R.H.(2018), “Nudge, not sludge”, *Science* 361(6401):431-431.
98. Tulving, E. et al(1982), “Priming effects in word-fragment completion are independent of recognition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8(4):336-342.
99. Weber, E.U. & C.Hsee(1998),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but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in attitudes towards perceived risk”, *Management Science* 44(9):1205-1217.
100. Weingarten, E. et al(2016), “From primed concepts to action: A meta-analysis of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incidentally presented word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2(5):472-497.
101. Yong, E.(2012), “Nobel laureate challenges psychologists to clean up their act”, *Nature* 490:7418-7418.
102. Zheng, J.K. & Q.Zhang(2016), “Priming effect of computer game violence on children's aggression level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4(10):1747-1759.

Research Progress on Priming in Economics

DAI Zhixin GAO Hongyu CHENG P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Abstract: Proceeding from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endogenous preference theory, economists have turned to priming techniques from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identity, culture and social norms in shaping preferences and personal behavior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specific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latest progress of priming research in economics.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 and precautions of priming research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controversies about replicability and ethics of priming technique. Priming technique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economists across the world, but its application in domestic economic field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nitiating prim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of institu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nd also provides research strategy and prospects in three aspects based on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realistic background in China.

Keywords: Priming; Endogenous Preference; Identity; Experimental Economics